

● 学林漫录

林语堂：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 颀

说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和胡适仿佛两座高山。鲁迅秉持中国本体立场，胡适倡导自由主义，他们同属反传统阵营，都希望建立“新的文明”。此外，大众的视野还需要一个特殊坐标，那就是林语堂，忽略他，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经验就会有大的缺失。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士人阶层失去入仕渠道，然后是清王朝被推翻，传统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趋于解体。面对新社会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应对？新文化运动干将大多从小接受中式教育，青年时期留洋，比如，胡适留美，鲁迅留日，目的是“开眼看世界”，赶上西方，这些“海归”往往态度激烈地反抗传统。

1895年，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的林语堂，接受的西式教育反而更有本土色彩，更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现代化阐释而不是摧毁后再重建。林语堂于1936年至1966年移居美(欧)三十年，并且以英文创作、演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是林语堂创作丰盛，声望起伏的三十年。

林语堂于1935年9月出版了第一部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这是一部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的

厚重专著，由美国的“中国通”赛珍珠作序，一经出版就广受欢迎，奠定了林语堂与赛珍珠及其夫婿华尔希的友谊。林氏英文著作后来长期由华尔希当老板的庄台公司出版。赛珍珠夫妇熟悉美国书界和图书市场，给林语堂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林语堂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谈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阐述一种跨文化人生哲学，出版后成为1938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赛珍珠夫妇功不可没。

林语堂身在国外，心系国内。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支持抗日，返美后写了一些英文小说，比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这些小说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背景，叙述人间的悲欢离合，内蕴仍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林语堂以木兰、黛云、曼娘的小说人物形象来分析中国女性的转型，描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女性，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进程画一幅多视角的全景图。

这些作品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这些作品有强烈的“中国味”。林语堂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部分加以阐述，对老庄人生哲学加以发挥，介绍中国人的美学、思想、生活以及民族特性、生活哲理等，这些都让外国读者很感兴趣。而他后期

作品比如《远景》等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丢掉了“中国”。当林语堂的写作对象脱离了“中国”情境，整个创作的生命力也变得干瘪。

林语堂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除了著作甚丰，他还非常关心汉语改革和拼音化。稍有积蓄之后，林语堂就投资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为此欠了十多万美元债务，连公寓都不得不出售。林语堂自传曾说看透人情，因此与赛珍珠夫妇绝交。经学者钱锁桥考证，双方交恶并非出于林语堂意指的势利。前期的合同可能比较苛刻，后期因林语堂的名望与财务的状况，双方在版权上出现分歧，生意谈不拢，友情结束，他的写作方向也受到了影响。

林语堂的视野具有国际性，关注国际事务。林语堂很早就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的危害，欧战如火如荼之时，他就预言了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关心印度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说要警惕美国霸权。这些发言在当时被人们嗤之以鼻，遭遇很多嘲讽，林语堂却没有表现他一贯提倡的幽默与灵性，而是坚持一种强劲的后殖民批评的风格，维护自己的立场。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林语堂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化所做的规划及其得失。

蔡锷将军曾经留下遗嘱：“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恩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国民，应为薄葬。”然而，自请“薄葬”的蔡锷，却成为中华民国国葬第一人。

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举国为之悲痛。孙中山抱病撰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给予蔡锷极高的评价。为了表彰蔡锷缔造共和的功勋，11月10日，湖南省长谭延闿致电各省，倡议为蔡锷举行国葬：“此公义旗首拔，艰险备尝，缔造共和，厥功最伟……国家追念元勋，自应赐予国葬……”12日，梁启超等人致电冯国璋及西南各省，赞成国葬：“松坡(蔡锷字)之歿，全为积劳，真所谓尽瘁国事，死而后已。综其生平德性及数载勋劳，求诸史乘，实罕伦比。谭督军拟为请国葬，此公实当之无愧……”19日，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复电，表示将为蔡锷举行国葬：“蔡松坡民国良将，共和殊勋，积劳病故，理宜隆以国葬……”20日，国务院称：“国葬条例已提交国会核议，国葬问题即将获得解决。”

同年12月18日，民国国会通过《国葬法》，对享受国葬者的资格、国葬经费、仪式等作了具体规定。黎元洪于22日依法下令国葬蔡锷和黄兴，派专人

蔡锷自请『薄葬』

陈扬桂

● 煮酒论史

来湘协理后事，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湖南省议会拨付16万元为营葬经费，成立国葬筹备处，对出殡规模、经过路线、码头选择、船只调配作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使灵柩顺利抵达墓地，组织人员拓宽上山道路，发布“出殡通告”。

1917年4月12日为蔡锷出殡日。这天，大雨滂沱，但送葬队伍仍有千人以上。3天后，比蔡锷早病逝8天的黄兴，以同样形式及规模，国葬于岳麓山。

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从蔡锷起，至1949年，共有27人享受了中华民国的国葬殊荣。其中湖南6人，即蔡锷、黄兴、李仲麟、林修梅、谭延闿、覃振，广东、浙江和四川各4人，安徽、河北及云南各2人，福建、山东和湖北各1人。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文史研究员)

从蒲扇到空调

黄田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读着明代小说家施耐庵创作的这首通俗易懂的七言绝句，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三四十年前没有电扇和空调的艰苦岁月……

上世纪70年代，结婚“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那时候，电风扇还是稀罕物和奢侈品。记得小时候，夏天，我跟母亲去赶集，天气闷热，骄阳似火。一条街上只有供销社的柜台上方安装了几把吊扇，许多人热得无处躲藏，只好聚集在吊扇下，用毛巾不停地揩汗。我也跟着母亲走进进去乘凉，我对母亲说，什么时候，要是咱们家能够买一台电扇该多好啊。

我家房子在村子的最北边，夏天，酷暑难熬，但日落西山之后，走廊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吃晚饭时，在灶屋里汗流浹背，大家便夹一些菜，端着碗，坐在走廊边的石头上，一边吃饭，一边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吃过晚饭后，左邻右舍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子大门口，坐在石头上纳凉。夜幕下繁星点点，萤火虫飞来飞去。大人们一边扇蒲扇，一边拉家常，或者给小孩讲故事。年轻人则走到村前不远处的石拱桥上乘凉，桥下流水潺潺，桥上微风习习。

晚上10点回家睡觉就不一样了。那时，大家的房屋都是木板结构的，白天，房间木板被太阳晒得滚烫，到了晚上还是火辣辣的，房间像个蒸笼。再加上蚊子众多，像轰炸机一样嗡嗡乱叫，不停地在身边轰炸。我躺在床上，没有蒲扇，背上汗巴巴的，三更半夜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腰包鼓起来了，农村很多人家盖起了砖木结构的楼房，很多家庭买起了电风扇，晚上吃饭、睡觉，在风扇的呼

吹拂下，凉爽得很。1997年我和妻子来到浙江打拼，那年夏天，买了一台落地“美的”牌电扇，现在还在使用着，它陪伴着我们度过了20多个闷热高温的夏天。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收入不断增长，不论是电扇还是空调，都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用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我所在的企业，有三幢七层的员工宿舍大楼，公司为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

近年来，地球气候变暖，“三伏”变成了“四伏”，每年持续高温达几十天，我们每天基本上开启空调。为预防感冒，睡觉时还盖上一床薄薄的被子，我认为这是最幸福的享受。只可惜母亲去世20多年了，感受不到如今的幸福生活了。

几年前，我们在城里买了新房，客厅和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还买了一台备用的电扇。冬天，外面雪花飘飘，房内春意盎然。夏天，外面骄阳似火，房内凉风习习。茶余饭后，一家人坐在阳台上谈天说地，叙旧话新，其乐融融。小区花红柳绿，曲径通幽，走进小区犹如置身美丽如画的桃花源。

“远看像车轮，近看像八卦。惯会出风头，人人都爱它。”大家一猜就知道这谜语说的是电扇。“一只柜子靠着墙，不穿衣服不装粮。夏天降温好凉爽，冬天升温暖洋洋。”大家想一想也知道这谜语说的是空调。这两则谜语，形象地说明了电扇和空调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是的，电扇、空调虽然算不上高科技，但酷暑寒冬缺不了，它不仅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还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从蒲扇到电扇再到空调，见证了祖国的发展进步！

(黄田，绥宁县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爱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渔歌

周文静 撰

中，便将李臣典写成了纵欲而亡。其实，这完全有悖事实。曾国藩的奏稿中对李臣典伤情有多次记载，一处是李臣典“矢志灭贼，屣于子石如雨之中，抢救地道，受伤两次”；一处是“十五夜贼出斫营，几至决裂，李臣典保守洞口，腰受大炮子伤”。而《李臣典病故请恤折》中对此记载更为详细：“六月十五日在地洞口受伤，十六日克复金陵城池，十七日因伤增病，医治无效。二十日昇回雨花台营次，医者谓伤及腰穴，气脉阻滞，不久恐变喘症，加以冒暑过劳，难期痊愈。二十三日，国荃亲往省视，李臣典不肯服药，自云此次万无生理，徒以圣恩未报，言之泪下，并无一语及其家私。即于七月初二日已刻出缺。”从此折来看，即使李臣典有纵欲之心，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李臣典足智多谋，不可能不识纵欲之害。湘军攻占天京一役，双方殊死搏斗，战事极为激烈，湘军总兵级的骁将郭鹏程、王绍义、陈万胜等相继阵亡，加上天气酷热、疫病流行，过于辛劳，李臣典因作战勇猛受重伤而死，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而据曾国藩的日记记载，在李臣典病逝的前一天，湘军另有一名将领李少山因战伤病逝。可见湘军在攻克天京后像李臣典一样病逝的将士并不是孤例。

李臣典为何逐渐被污名化呢？除了与对湘军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定位有关外，恐怕也与李臣典身为攻占天京的首功之臣有关，这使他成了一个“箭垛子式”人物，将湘军的一些恶行都附加到了他的身上。

(张东吾，新邵县人，其作品入选《邵阳文库》《芙蓉花开》《芙蓉国》《原上草》等多种选本)

● 史海钩沉

被污名化的李臣典

张东吾

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出现脸谱化的趋向。有的人逐渐被塑造为完人，而有的人则逐渐被污名化。李臣典无疑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典型。

李臣典(1838—1864)，字祥云，谥忠壮，今新邵县巨口铺人。湘军统帅曾国藩曾称赞李臣典“性情朴实，忠勇绝伦，治军爱民，井然有序，料敌制胜，毫发不爽，实为难得之将”。

李臣典人生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获得攻占天京的首功。但在李臣典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一个昔日同僚朱洪章写了一本书叫《从戎纪略》，书中极其夸大自己的战功，并四处散布流言：“曩者之役，余实先登，李(指李臣典)资高，适猝死，主帅与朝廷务张之，以励将士，故李独尸大名。”在朱洪章眼里，似乎他才是攻占天京的首功之人，而李臣典只是因为骤逝才捡了漏。果真如此么？其实不然。首先，朱洪章的《从戎纪略》内容极不真实，如他将萧孚泗捕获太平天国忠王李秀全、福王洪仁达的功劳据为己有，建立在虚假之辞上的战功并不可靠，倒是其浑水摸鱼、沽名钓誉之心昭然。其次，谁是攻克天京的首功之臣，朱洪章说了不算，只能清廷说了算。曾国藩兄弟说了算。曾国藩不仅在向朝廷的奏稿中将李臣典列为第一，而且在日记也有体现：“至信字管见李臣典，该镇(李臣

典被授予河南归德镇总兵)为克城第一首功。”“盖祥云英勇绝伦，克复金陵，论功第一。”可见，绝不是因为李臣典骤逝，曾国藩才将他推为首功。第三，李臣典战功卓著，实至名归。由曾国藩兄弟起草的《李臣典战功清单》长达2600字，详细记载了李臣典随同曾国荃转战江西、安徽、江苏三地，克吉安、拔安庆、破雨花台、夺秣陵关，“轰塌坚城，歼除巨寇”的辉煌战绩。其中甚至记载，在克复安庆时，“李臣典执旗先登，人已推为首功云”。在攻占天京时，李臣典“设计掘地潜攻，身任其役”“身先士卒，直冲倒口而入”“与刘连捷、伍维寿、朱洪章、武明良等首先登城，入城之后扼住太平门，杀贼甚多”，战绩也在诸将之上。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决策居第一。”这也是李臣典明显高于其他湘军将领的地方。清末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直言：“则掘隧轰城，发策实由忠壮，何止奋勇先登而已。故朝廷亦有谋勇过人之谕，推为功首，孰曰非宜。”

相比李臣典的战功，他的死因遭到更多的污名化。在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中，李臣典是贪色无耻之徒，最后倒在春色之下。因为是小说，姑且不论。但在一些纪实性著作中，也出现了丑化李臣典的现象。如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一书